

曹景行著

香港

十

回归时刻·从终点到开端·风暴中的香港·去内地，还是不去内地·香港社会观察·闲话香港人

年

XIANGGANGSHIN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香港

十

曹景行著 XIANGGANGSHIN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十年/曹景行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326-2184-2

I. 香... II. 曹... III. 时事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108 号

责任编辑 金 柯
封面设计 姜 明
版式设计 杨钟玮

出 版 人 张晓敏

香 港 十 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2.5 插页 16 字数 209 000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184-2/K·415

定价: 2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5412745



曹景行

祖籍浙江，1947年生于上海，属于“老三届”中最“老”的那群。1968年下乡到皖南的茶林场，伴黄山十年。

1978年获复旦大学录取，举家返沪。学历史四年后，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前后六年。

年逾四十移居香港，为谋生转入新闻行业，至今十七八年。前八年在平面媒体打工，初入《亚洲周刊》当撰述员，后任副总编兼《明报》主笔，并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文报章撰写评论。

五十岁时再次改行做电视。先入“传讯电视”，主管“中天”新闻频道数月。1998年加入凤凰卫视。在电视新闻评论和台湾新闻报道两方面一直在做实实在在的探索。与同事一起创办了《时事开讲》、《总编辑时间》等栏目。现主持《口述历史》和《景行长安街》。

2005年7月开始，在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做访问学者，教课。



我与香港

转眼间，香港回归已近十年了。和上一本书《光圈中的凤凰》一样，又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朋友张晓敏和金柯的一再敦促下，又是用了春节一个星期的空闲，把过去许多年间写的有关香港的文字作了整理，抽出这几十篇成书，也算是一个小结。

我在香港写评论，九十年代初开始触及香港本身的事情，主要刊登在香港的《亚洲周刊》、《明报》、《明报月刊》和《武当车志》，美国的《明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马来西亚的《中国报》和《南洋商报》等海外媒体上面，最近两年又增加了BBC的中文网站。几乎每一篇都是赶稿、赶新闻，落笔的时候绝没有想到十年八年之后是否还会有人看，是否看得明白。更何况当时是为海外读者所写，好些事情又有独特的时空背景，今天读起来难免会有点辛苦，请各位体谅。

我在世上这六十年中，关系最密切的地方除了上海，就数香港了。模模糊糊还记得三岁那年的夏天，父亲从上海北站登车南下的情景，自此，香港就与我们家连在了一起。首先是三天两头就会收到来自香港的邮件，邮票上先是男的英王头像，后来变成了女王。接着每月都会收到来自香港的汇款，不多不少正好可以

养活全家老少六七口人。一百港元兑换四十二元七角人民币的汇率，一二十年不变，直到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港币大贬值。

父亲寄来的香港报刊，使我从小就知道世界上居然有那种叫“油麻地”、“旺角”的地方，所以后来我移居香港，对这些地方竟然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父亲去了香港，我们一家就有了“海外关系”，许多特别的遭遇，幸与不幸，全都无从选择和逃避。十多年前，朋友在香港办刊物，要我写一些上海的陈年旧事，下面附上三篇，可以看出我十来岁时对香港的印象和关联。

白糖、猪油和面粉是可以救命的

有一个很带点学院气的词语，叫做“集体记忆”。经历过六十年代的香港人，他们的集体记忆应该有水荒，有难民，有六七年的“暴动”，还有就是给内地亲友源源不断寄去、带去基本生活用品。母亲一次从香港回上海，经过罗湖，看到海关关员检查香港人带到内地去的一袋袋、一包包的物品，有些布袋是用五六层白布缝起来的，实际上是送给亲友做衣服的，缝成袋子是为了逃税。

内地的物资极度匮乏，前后大约延续了二十年。五十年代末出生的孩子，大概到他读大学，仍想不到会有一天可以不受限制地吃饭、吃肉。现在已记不得那时每个人领有多少种票证，可能不下四五十种吧。农村比城市更甚，一九六八年我从上海到安徽南部安家时，才发现那里原来连买火柴、电灯泡也要凭票，洗衣肥皂是每人每月半块。

最艰苦的年月，正是我们那一代人刚开始发育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九六〇年冬季的几个月中，上海每个居民每天只配给人民币一分半钱的蔬菜。说是菜，其实是几根手指粗的胡萝卜，或者是洋白菜外面青绿色的老叶子，大家都叫它“光荣菜”，因为样子像极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戴的“光荣花”。还有一种“雪花菜”，实际上就是给猪吃

的豆腐渣，也拿来给人吃。

后来开放自由市场，吃猪食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但对于我们这种中等收入家庭来说，自由市场上的东西仍然太贵了。外祖父病倒床上一年多，去世前不久为他到自由市场买了一只母鸡，三十多元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一般人仍然要靠政府的配给，每月凭票买二十几斤米、几两肉、几个蛋，有的要分上中下三旬三次买。还发一种点心券，凭票可到食品店里买一件糕饼。我认识一位个子高高的大学生，每个星期买回一块饼，用力切成同样大小的八块，每天晚上睡觉前吃一块，星期天吃两块，直到大学毕业离开上海。

近来看了友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几年农村的状况要比城里惨得多。上海至少没有饿死人，至多是普遍的营养不良，只是浮肿而已。而我们这些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又比旁人享有一些特权。政府为了吸引外汇，专门开设了“侨汇商店”，按照汇入款额多少发给票证，拿着它可以到那种门口有警卫守着的商店平价购买外面买不到的日用品。

香港突然成了许多人的救星，“侨汇票”也成了所有票证中最热门的东西，很快就有了黑市交易。许多人还要香港的亲友寄糖、油、面粉来，可能是数量愈来愈多，最后就出现了香港寄单上海提货的方式。每次拿到单子，我就跑到人民公园对面华侨饭店底层的华侨旅行社扛回令路人眼红的食物。白糖、杂粮、白面粉是用白布袋装的，猪油则装在马口铁皮做的小方盒子里，吃完后又用来装别的东西，许多年后家中还可以看到。

父亲除了给我们寄东西，也常收到其他亲友要求接济的信件。二十年后我到浙江绍兴市的鲁迅故居参加一个纪念会，碰到周作人的大儿子夫妇。他们告诉我，当年如果没有香港朋友寄来的白糖等食品，他们全家真不知能不能捱过来。后来翻阅周作人那一时期的信件，更相信这一说法。直到今天，我仍然要感谢来自香港的救命食品，虽然它们实际上都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的。

香港电影给上海人带来“奇装异服”

“现在的香港电影没有老早(以前)好看!”四十来岁以上的上海人常常会对追看成龙、刘德华电影的小辈作如此判词。他们心目中“最好看”的香港电影,指的是五六十年代香港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等拍的一些片子。凡是从那个年头活过来的上海人,没几个不知道石慧、傅奇、陈娟娟、夏梦……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不只是香港电影明星,而且代表了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的中国早把“美帝国主义”的电影完全摒推于国门之外,西欧和日本的电影一年之中偶尔进口一两部,放得最多的外国电影是“老大哥”苏联的电影,但自六十年代中苏闹翻脸,苏联的东西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于是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几个“小兄弟”的电影可以放映。另外就是上面讲到的那些香港电影了。虽然出自左派公司,但与内地政治挂帅、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毕竟不同,对上海人,尤其是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少年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一天校长和班主任大发其火,原来班上有同学逃课通宵排队购买新上映的香港电影门票,其他班级也有。学校专门派人到电影院门口把他们拉回来。一些厂里的“青工”也调休或请病假去买票。一些香港片赚人热泪,另一些则叫人大开眼界,影迷争相模仿剧中人物的打扮。上海滩理发店的老师傅一定不会忘记,有一年,成群少女到店里指定要做夏梦在《新婚第一夜》里的那种头发。

那时的风气已经愈来愈左,有人看到街上的青少年模仿香港影星打扮,就浑身不舒服起来,于是把夏梦头、飞机头、小裤脚管、尖头皮鞋……一概称作“奇装异服”,并在报刊上组织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中国青少年的“和平演变”,经常看香港电影很可能成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题目。但每次放香港电影仍然吸引成千上万观众,直到“文化大革命”来临。

实际上,没到“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上海就已停止放映香港电影。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港式“奇装异服”立即成为革命的对象。有几天上海街头到处可见红卫兵手拿剪刀强行剪去路人的“小裤脚管”,或见有人手提“尖头皮鞋”赤脚逃回家中。南京路上的理发店、皮鞋店、西服店都被贴满大字报、大标语,糊了一层又一层。

“文革”之灾也祸延香港。第二年“反英抗暴”高潮时石慧、傅奇夫妇被港英驱逐出港,在罗湖桥当中静坐抗议,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但长城、凤凰等左派电影公司却因“极左”路线而气息奄奄,邵氏趁势而起。

等到“文革”结束,香港电影重又在上海放映,那班老影星已所剩无几。但年岁大一些的上海人对他们仍是念念不忘;这不是一般的偶像崇拜,而是一种美好的回忆,记起严寒中的一丝温暖。难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前后上海一家电影院举办“香港电影回顾展”,竟会有那么多人赶去观看;有的片子更一再加场,前后共放了一百五十多场,票房收入把成龙的《红番区》都压了下去。

老上海对香港老片如此着迷,也带动了一班青年。他们要看看究竟为什么阿爹阿妈会如此倾倒。一看之后,他们也感到确实不错,于是一部部看下去,有人一连看了七八部之多。还有一些上海人是来“补课”、“还债”的。三十多年前上海放映那些香港片时他们年岁尚小,家长、老师不让看,心中却一直遗憾着,没想到今天有了一偿夙愿的机会,真是历史作弄人。

废品回收站不要香港报纸

当年上海的中学生中,本人可算是对香港最有概念的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近十年中,父亲把每天的香港报纸寄回上海,当然只能是《大公报》,一段时期还有《新晚报》和《周末报》。那时香港报纸售价大概是每份5仙,平邮到上海每

份也是5仙，每星期寄一次，就是不小的一捆，邮递员送上门挺辛苦的。

五六十年代的《大公报》每天就两叠，新闻加副刊。香港的报纸，内容比上海的报纸要丰富许多倍。像美国女星嫁到赌国摩纳哥做王后一类的事情，根本登不上内地报纸的版面，在《大公报》上则看得到，至今还留有淡淡的印象，只是永远搞不清那位王后叫嘉丽斯姬莉还是姬莉斯嘉丽，颇有点失敬。三十年后她因车祸去世，上海报刊炒得极热，还说可能是谋杀案，可见时代不同了。

天天看香港报纸，主要看天下大事，顺带也翻翻香港本地新闻。记得最清楚的，是常常见到香港人排长龙在水喉（编者注：即“水龙头”。此处是指香港当年街头供水站）前等水的惨状，这也是令我视香港为畏途的一个原因。另外，每天都有打打杀杀的事情，其中又必会夹着旺角、油麻地、太子、铜锣湾之类稀奇古怪的地名，给人一种神秘感。而像“架步”、“差佬”等名词，有些还猜得出来，有些比外国话更难，想查都找不到词典。

家中有了香港报纸，开始只是自己看，后来有的亲友、同学知道了，也登门借阅，每次都叠得齐齐整整地送回来。但这毕竟是“舶来品”，不是很熟的人不会借出，以免生出麻烦。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有海外关系就可能遭到无妄之灾，要向小学文化水平的派出所警察或居民委员会干部解释清楚《大公报》是“自己人办的报纸”，恐怕难度极高。

没想到后来还是碰到一些麻烦。那时内地经济落后，收购废品的工作倒做得不错，上海每个居民区都设有废品回收站。这主要不是环保，而是因为物资缺乏，可用之物尽量再用。上海本地报纸每天一大张纸四个版，薄得不能再薄。但无论是机关、工厂还是家庭，都会把看过的旧报纸存起来，一两个月下来扎成一捆送到废品回收站卖钱。大报（如《解放日报》）和小报（如《新民晚报》）还必须分开，分别称分量。记得大报每市斤可卖人民币八分钱，小报五分钱。每次换个一元几角的，也可以抵充一两天的家用，或者给孩子当零花钱。

与上海当地报纸相比，《大公报》每天两叠，纸质又好，神气多了，一个月下来就

是一大堆，送去废品站可卖不少钱。但有一天却碰了壁，说是上级不准收购香港报纸。原来这些旧报纸回收后主要作包装之用，如粘成纸袋给食品店装东西，不收香港报纸或许是害怕它们再作流传。

不能当旧报纸回收，当废纸贱卖又于心不甘，一位小学时的同学、中学时的老友想到了街头的地摊。六十年代的内地经济几乎崩溃，政府为了让老百姓活下去，又允许一些人做小生意谋生，上海街头出现不少摊贩，有的专门收购、出售旧书旧刊。我们拿着一捆《大公报》在小街上找到一个摆地摊的，问他收不收。他一看喜出望外，居然有人把难得一见的香港报纸送上门来；我们也喜出望外，他居然出价每份人民币一角。按当时的汇率（港币一元换人民币四角二分几）计算，一角人民币比报价加上邮费还多。

如果当时有做生意的头脑，这应是一条不错的生财之道，但我们想都没想过，只是过一段时间就把旧《大公报》送去那个地摊，换几元钱买书、看电影。后来，街头摊贩又不见了；再不久，《大公报》也不准寄进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移居香港时，已经四十出头，居然还能一切从头开始，可见那块地方的确有点特别。八十年代末刚到香港时，第一感觉是“晕”，白天中环的高楼，晚上弥敦道的灯光都会让我发晕。最叫我感叹的是北角住处楼下那间小小的“惠康”超市，里面货品的种类比当时上海南京路的“第一食品公司”还要齐全，“什么时候上海也会有这样的超市呢？”这是我到香港第一天脑子里冒出的问题。

另外一种特别的感觉，来自香港政府的“人民入境事务处”。那天去办理身份证，一个会讲普通话的戴眼镜小老头专门对我作了一番询问，详细了解我在上海的工作单位“社科院”究竟是什么样的机构，下面有多少个研究所，研究些什么。我所知有限，心想，早知如此，就带一本介绍手册送他了。后来有朋友说，这个小老头一定是“政治部”的，直属伦敦军情六处，专门在香港收集中国情报。但一个连上海社科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老先生，也会是“007”的同行吗？我怀疑。

那时像我那样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一般来说是低人一头的。最起码的，你本来的学历学位和专业资格全都不作数了。内地的医生、教授来到香港后改行当看护、看更（看门）的，并非奇事。而许多香港人对中国一脸看不起，对内地来的“新移民”种种歧视，正是他们最丑陋的地方，但这也恰恰是回归十年以来香港社会改变最大的地方。我的一些文字，大致上写出了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

今天的我早已是香港永久居民了，有了这个身份，我可以随时出发到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但对于香港社会，我更多地还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作观察，看着它如何走出回归前的彷徨，也看着它如何经受回归后的调适。只要香港仍然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我还是会继续观察下去。至于香港的未来前景，我相信的是：只要中国未来会更好，香港也一定会更好吧。

曹景行

2007年3月

说明：本书所用照片未署名者均由曹景行先生提供。

CONTENTS

目录

X I A N G G A N G
S H I N I A N

序 1 我与香港

WO YU XIANGGANG

第一章

1 回归时刻

HUIGUI SHIKE

香港人要补课/3

最后一场马赛：逾亿奖金破纪录/6

过了“七一”，香港人说什么话？/9

香港五十年变还是不变？/11

香港街头看回归气氛/14

“中国因素”左右香港未来/17

回归日看《鸦片战争》别有感受/20

诉不尽的“最后”情怀/23

屈辱一百五十六年，应感谢殖民主义？/26

港督告别埋“钉子”，特首就职词“偷心”/29

上海繁荣直逼香港/32

35

第二章

从终点到开端

CONG ZHONGDIAN DAO KAIDUAN

从历史的终点走向历史的开端/37

须发挥香港新优势/40

香港“母语教学”的困惑/43

“八万五”成为香港经济风向标/46

新加坡减薪激发香港危机感/49

香港何处觅人才？/52

百万香港人难捧旧饭碗/56

香港会在“互联网泡沫”中迷路？/59

疫后重建 香港探路/62

第三章

风暴中的香港

FENGBAOZHONG DE XIANGGANG

首先要稳定人心/67

金融风暴下的两个“两难”/70

香港人祈盼虎年转运/73

金融风暴把香港与深圳拉近/77

港府大战国际炒家/81

港府反击炒家赢得民心/86

对冲基金有难令香港政府松口气/88

揭发金融界双重标准/90

经济好转,香港人心情也好转/92



97

第四章

去内地,还是不去内地?

QU NEIDI HAISHI BUQU NEIDI

香港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99

中国“入世”改变香港“中介”地位/103

香港能成为中国的教育中心?/107

只见“浙商”,不见“港商”/110

去内地,还是不去内地?/112

香港人对内地客的矛盾心态/115

香港开始到内地抢人才/118

香港内地“礼”尚往来/120

第五章

香港社会观察

XIANGGANG SHEHUI GUANCHA

媒体和“人办”究竟谁更加不知羞耻?/125

世风日下香港人格分裂/128

通缩阴影下的超市减价战/130

开赌场比搞环保更重要?/134

请看香港传媒界的众生相/137

女孩之死/139

香港孩子眼中的“新移民”/142

香港原来是戒烟好地方/146

台北“捷运”比香港“地铁”多点文化/149

香港最神秘的货柜车“司机大佬”/152

香港无法“洁身自保”/154

香港新年好戒烟/156

159

第六章

闲话香港人

XIANHUA XIANGGANGREN

香港人昏头昏脑如何能搞高科技?/161

香港人该从云层上走下来了/165

失去价值标准的香港年轻一代/167

米老鼠也要港人讲普通话/170

做新闻的和开的士的谁更倒霉?/172

这样的投机者香港有几个?/174

香港人为何说不好普通话?/177

香港人为什么应该学讲普通话?/179

三个不是问题的问题/181

我看香港/184



Xiang Gang 第一章 回归时刻



